

史学新论

魏晋南北朝史发展要义二题

朱大渭

【提 要】魏晋南北朝约 400 年,为分裂割据时期,战乱促使人们思维活跃,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皆出现了承上启下的新内涵。而其要义则为政治上的儒法结合和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经济上的均田制,文化上的永明新体诗和骈文的出现,所有这些对后世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三省六部制 均田制 永明体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6-0112-07

魏晋南北朝史一般从东汉末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讲起,到隋文帝杨坚代北周灭陈(公元 589 年),共 394 年。这个时期汉族和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共建立过 35 个大大小小的政权,为了扩充地盘或实现统一,群雄角逐,战乱不已,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其中个别政权虽偶有局部统一,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所恢复,但时间都很短暂。总体说来,这是一个长期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时代,是各类封建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是战乱频繁社会极度动乱的时代,是空前绝后的民族大融合时代,也是北方人民大量南徙的时代。这时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在激烈斗争中,人们创新思维活跃,因而各类人才辈出。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出现了数十位顶尖的政治革新家、军事家、经学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书画家、农学家、医学家及其他科技发明家,而且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以及科学技术繁荣昌盛时期。总之,这 400 年中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非常复杂,头绪纷繁。尽管如此,历史的规律常常是在大动荡大破坏中走向新生,历史进程继续向前发展。即恩格斯所讲:“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如果从两汉到隋唐历史发展进程总体考察,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由于当时史实繁多,头绪杂乱,这里我们只能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要义集中简略地讲二个大问题。

112

一、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相较于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体制在这一时期形成。从曹魏时起,尚书台变成了皇帝领导下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加强和组织机构的扩大,南朝时正式称为尚书省。分设吏部、祠部、度支、左户、都官、五兵六曹,执行具体事务。尚书令的权力日益扩大后,皇帝认为有必要加以牵制,于是设中书监、令。后来,中书监扩大为中书省,成为国家的中枢决策机关。而随着中书省权力的增长,皇帝又以侍中参政的办法牵制中书令。北魏多以侍中辅政,侍中也就逐渐扩大为门下省。至此,三省制度正式形成。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唐承隋制,将三省六部制加以完善。中书受皇帝旨意草拟、颁发诏书,是掌握机要、决定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门下省对诏书、政令进行审议封驳,是审议机构;尚书省为执行机构,具体执行中书省颁布的皇帝诏旨和经门下省审阅、皇帝批准的各种奏章。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奉行”,三权分立,互相牵制,避免专权,这是限

^①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49 页。

制君权和相权的一个巨大进步。以后，中央官制虽有发展变化，但这种格局基本沿袭下来。^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彻底脱离了行政系统，制度严密，并深入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与法制性，在国家组织中地位明显提高。御史台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其主要职权在于对中央和地方官员及军事领导层的不法行为进行监察和惩处。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东汉后期，察举制这种选官制度逐渐失去了作用，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笑谈。曹丕在公元220年称帝以后，接受颍川世族陈群的建议，创立了九品官人法。^②九品官人法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和才能并重；到西晋，主要看门第和家世，甚至成为唯一选才的标准，成为世家大族垄断官吏选拔、培养私家势力、维系政治特权的工具。^③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九品官人法已经无法继续推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官人法，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隋炀帝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建立进士科，至此科举制正式形成。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代统一六国，专制集权，主张法治，但单靠严刑峻法，因而皇统短暂，两汉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革新政治家们总结秦汉统治经验，主张儒法结合，实施仁政，减轻农民负担，施行礼乐教化，又辅之以法，并引礼入律，既赏罚严明，又量刑轻重合理。这里举出诸葛亮治蜀、王猛治前秦、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苏绰制“六条诏书”四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时期的治国理念。

诸葛亮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德”、“威”兼举。他强调治国时要“训章（典章教化）、明法”；“劝善（德治教化）、黜恶”；“礼有所任，威（指法）有所施”。诸葛亮在德法并重的前提下，又特别提倡要以德治教化为先，法治为后。诸葛亮曾说“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就是说，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要言行一致，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符合德（礼）法并用的政治统治原则，这是对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体系的高度概括，这种认识使整个封建的政治思想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治国理念下，他辅佐刘备、刘禅创建和治理蜀国，以非凡的努力，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实行了一系列比较进步、开明的政治措施，其中主要的归纳起来有：正身、纳言、举贤、明法。即1.正身以教人、行令。他认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身教重于言教，君主要给臣

下做出榜样来。也就是说，德治教化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这样，政令才易于贯彻，收到成效。2.纳言以采众下之谋。诸葛亮认为治国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就好比有了更多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看得清，听得全，使人有智慧，更明鉴，能够把国事办得更好。相反，如果人君拒谏，不能采纳正确的建议，那么“忠臣”不得信任，奸邪之人就会乘机钻营，祸国殃民，这些比喻是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发人深思。3.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十分重视选才择英，进贤进能。在诸葛亮看来“贤”的标准，就是要德才兼备，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只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就不以资历和门第为限，大胆破格地选拔使用。4.法纪严明为治之要。诸葛亮认为要拨乱反正，由乱到治，必须实行法治，严于执法，赏罚分明，取信于民，赏罚均平。诸葛亮所采取的各项政治措施，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总的政治目的：“富国安家”。怎样做到富国安家呢？他认为除了上述政治措施以外，在经济上带有根本性的方针是奖励农耕，让农民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在诸葛亮治理下，蜀国政治稳定，人民受的压迫剥削较轻，生活比较安定。诸葛亮治蜀所显示的才能和收到的成效，历来为人们所公认。^④特别是唐太宗曾多次向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称道诸葛亮治蜀，指出诸葛亮为“贤相”，治国用法“平直”、“至公”。^⑤

十六国前秦苻坚是一个有着经世济民、统一天下大志的氏族统治者。他在位以后，重用汉人王猛，实行了一系列治国举措。其一，王猛着力整顿吏治，严明赏罚，擢拔贤能。当时朝廷内外有一批氏族显贵，仗恃与皇室同族或“有功于本朝”等，身居要职，恣意妄为。王猛的矛头首先对准他们，全面彻查害民乱政的公卿大夫，将横行不法的权贵二十多人铲除干净。“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令行禁止。^⑥其二，王猛兴办教育，大兴儒学培养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前秦恢复了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广修学宫，聘任学者执教，并强制公卿以下子孙入学。苻坚每月亲临太学一

① 参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 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③ 参见唐长孺《士族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以上参见拙作《论诸葛亮治蜀》，《六朝史论续编》，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⑤ （唐）吴兢：《贞观政要》，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6～99页。

⑥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次,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并与博士等教官讲论学问,以督察学校教育,扩大号召力和影响力。苻坚亲率太子、王侯公卿大夫士之长子祭祀孔子,宣扬儒教。这样,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在北方很快得到复苏和振兴,而官僚后备队伍的培养工作也走向正规化。其三,调整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废除了胡汉分治之法,确立了“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基本国策,诸族杂居,互相融合。其四,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在王猛的主持下,革新措施带来了一派崭新气象。史载,当时前秦境内安定清平,家给人足,百姓歌唱道:“长安大街,杨槐葱茏;下驰华车,上栖鸾凤;英才云集,诲我百姓。”王猛治国有两句名言:“治宁国以礼,治乱世以法”,^①即礼法相互为用,视国家整个形势,巧妙灵活运用。

北魏前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冯太后和孝文帝采纳了李安世的建议,推行均田制,同时配套施行了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通过三长制,政府把大量“隐丁漏口”重新编制为国家的编户。新的租调制使人民的租税负担平均减轻了二分之一。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病故。年方二十三岁风华正茂的孝文帝亲理朝政,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后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迁都和汉化。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当时中原文化中心洛阳。紧接着,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一)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人原为复姓,魏孝文帝下令将复姓一律改为汉族单姓。(二)禁止胡语、易胡服。(三)定姓族。孝文帝通过法律形式在北方重建魏晋以来盛行的士族门阀制度。一方面,对汉族地主阶级,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四姓。另一方面,对鲜卑贵族,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与汉族四姓地位相当,不得授以卑官。(四)通婚姻。孝文帝在定鲜卑和汉人姓氏的基础上,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通婚。通过胡汉通婚,使胡、汉最高统治层在血缘关系上融合起来。(五)变制度。行政机构和职官名称全部汉化。在礼乐制度方面,祭祀、丧礼、冠礼,采用汉制,改易旧习。并主持厘定魏律。^②孝文帝厉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户口激增和经济实力增长上北强南弱的形势基本形成,促进了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西魏时代,宇文泰执政,重用苏绰,进行改革。苏绰创计帐、户籍等法,精简冗员,设置屯田、乡官,增加国家赋税收入。所撰六条诏书,实为执政纲领,为隋唐盛世奠基,最为后世称道。这六条诏书为“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具体内

容是:1.为政的人首先应当心术端正,善于分辨是非;2.要教育人们养成敦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华虚伪的习气;3.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用于生产;4.选贤任能,用人要看能力,不能光看门第;5.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冤枉好人;6.赋税和徭役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穷苦老百姓的身上。宇文泰将六条诏书立于座右,令百官习诵,规定不通计帐法及六条者,不得为官。^③

从上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四个不同的统治集团,但其治国理念却有着一个相同的特点,即儒法合流,它下开唐代礼法相互为用之先声。我国封建时代重要法典《唐律疏议》,正是在上述治国理念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军事制度上,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北周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为了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提高士兵身份以加强军队战斗力,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50年),宇文泰仿拓跋部早期八部之制立八柱国大将军,正式建立府兵制。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宇文泰又仿拓跋部早期“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形制,赐给府兵中统兵官(不论汉人还是其他族)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将士亦从主帅改姓。府兵制下,共设八柱国大将军,实际领兵官为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各发二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又各设二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每开府下,又各设二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以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领兵官。每仪同领兵千人,则开府领兵二千,大将军领兵四千柱国大将军领兵八千,总兵力近5万人。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在家乡耕作劳动,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遇有战事,则奉命征调,事毕返回所属之折冲府。因此,在府兵制下,凡兵皆农,兵农一体。府兵之兵器、粮食、日常用品,均需自备。加上由于府兵平时务农,生活无异于农民,国家毋须为其负荷军饷,因而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战争时期,由中央临时配备将领,率领府兵奔赴征战;战争结束,兵归其府,将帅则解除兵权。这种措施使军队不至于成为将帅私有,减少了军人拥兵专擅或割据的可能性。府兵制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府兵制成为均田劳力编制的基础。唐玄宗天宝年间停废,历时约二百年。^④府兵制对于强化封建

① 以上见《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以及附《王猛传》。

② 《魏书》卷108《礼志》、卷109《乐志》、卷111《刑罚志》。

③ 《周书》卷23《苏绰传》。

④ 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1页。

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北周统一北方，隋统一全国，以及隋唐军事力量强大，都与此有关。

均田制度是北朝魏孝文帝执政直到隋唐施行的。北魏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正式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1. 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倍授田，以备休耕。男丁每人授桑田二十亩，课种桑、枣、榆树。不宜种桑地区，男丁授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和耕牛也授田。2. 露田不准买卖，“年及课则授田，老免（课）及身没则还田。”奴婢和耕牛，有则授田，无则还田。“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并可以买卖。3. 人多地少之处，居民可迁向空荒地区。土广民稀之处居民不得无故迁移，可以向官府申请借种授田后余下的土地。4. 民户因犯罪流徙或户绝的，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为均田授受之用。^①以后北齐、北周沿袭并完善了均田制，到唐代中期才逐渐衰落。均田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士族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在均田制下，政府将苑囿、禁地、牧场、荒地给予农民。由于均田制既不违背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又多少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对土地兼并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有利于保护个体小农土地和生活的稳定性，因而能够基本上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延续近三百年之久的一种重要田制，一直推行到中唐。它对开发荒地、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保护农民小块耕地的稳定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北方经济大发展。并对北魏国势强大，北方经济恢复，以及全国的统一，隋唐强大帝国的建立都从经济基础上起到保证作用。

自秦汉二千余年，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虽然有分有合，但儒家大一统思想始终占主流地位，因而整个中国历史大多数时间为统一王朝。这近400年尽管长期分离割据，但无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士大夫文人士、各族广大人民群众都心向统一，反对分裂，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及学术思想繁荣科技昌盛时期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

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当时从政治斗争到思想理论斗争的许多主张，都与儒家名教相悖逆。曹操在群雄逐鹿中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他多次下令主张“唯才是举”，“盗嫂受金（者）”皆可录用。鲍敬言从老庄任自然的思想出发，针对儒家所谓“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说，提出了著名的“无君论”，反对国家、君臣、政治制度的存在。与“无君论”思想相辉映的，乃是“神灭论”和“笑道论”。^②从西晋阮瞻的“无鬼论”，到刘宋范缜的“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再到范缜的“神灭论”，北周甄鸾的“笑道论”，均在于反对佛道教义及维护封建统治的神仙鬼神之说。特别是范缜的《神灭论》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推向顶峰，它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趋向自觉，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上述对封建统治理论核心名教禁锢的突破，以及对封建统治政权核心君权的否定，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人们思想的一次相对解放，从而促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向自觉趋向型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最深，因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思想观念，最能说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自觉趋向程度。东晋葛洪曾生动地描绘了两晋南方妇女的社会生活，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亲访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途中有说有笑，有时甚至举杯痛饮，引吭高歌。^③这里所表现的妇女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地位，似乎同男子没有多大区别。北朝妇人主持家务，参予为子求官、为夫诉屈等政治活动，以及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显然是鲜卑习俗对北朝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它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这股历史主流对当时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由于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冲击，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染，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有了掌握文化的机会，因而当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深通儒家经典的女文人士。她们写下了诗、赋、谏、铭、颂等流传于后世。南朝齐武帝封擅长词赋的吴郡妇人韩兰英为女博士，“教

^① 《魏书》卷110《食货志》、《通典》卷3《食货·乡党》。

^② 《梁书》卷48《范缜传》，《广弘明集》卷9《笑道论》。

^③ 《抱朴子·外篇》卷25《疾谬》。

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云”。^① 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山外游学,步入仕途,从军,自由选夫等为封建伦理纲常所不容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有出现。南朝齐代东阳郡女子娄逞,不甘心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打扮成书生,只身来到京城建康,遍游公卿,仕至正八品的扬州议曹从事。^② 这些妇女自觉趋向的观念和行为,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的高层次推求,前人所揭示的当时百家争鸣中出现的所谓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以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鲜明对立,这种文化学术思想领域的对抗、交融和繁荣,本身既促进了人们文化心态自觉趋向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走向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魏晋玄学以对儒家名教质疑而兴起后,给人们的思想境界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魏晋知识层体现出来的新型人生观,正是两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在现实中破产后,面对乱世苦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性追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③

总之,魏晋以降人们文化心态的自觉趋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最高知识层的“自由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又必然推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辉煌发展。下面从历史学、经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1. 历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替、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激烈的阶级、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伟绩,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书和本朝国史。官修史书之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涌现出许多史学名家,如陈寿、华峤、司马彪、鱼豢、陆机、王隐、袁宏、干宝、孙盛、裴松之、范晔、臧荣绪、沈约、裴子野、崔鸿、魏收等。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的史书,十之八九产生于三国至南北朝期间,而且往往“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据不完全统计,在这约400年间,以纪传、编年二体修撰的东汉史有12家、三国史有15家、两晋史有23家、十六国史有29家、南北朝史有24家。最为著名的有晋朝陈寿所撰《三国志》65卷;刘宋朝范晔著《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萧梁朝萧子显撰《南齐书》60卷;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100卷;北齐魏收撰《魏书》130卷。另外,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12卷,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酈道元《水经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

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东魏阳衡之撰成《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城市地理名著。当时学术界特别重视撰修历史,这是中华民族重视修史的传承,所以是各族人民的人心所向,时代的需要。这些史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瑰宝。

2. 经学。魏晋时期,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今古文壁垒和师法、家法的界域,也摒弃了其烦琐、迂腐、荒诞、粗俗的内容,而力求有所创新,形成了不同于汉儒风格的魏晋经学。唐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所用魏晋人经注有三、汉人经注有二。今存《十三经注疏》中,除《孝经》注是唐玄宗所作外,汉注与魏晋注各居其半。其中晋注就有:王弼、韩康伯注《周易》,何晏集解《论语》,杜预集解《左传》,范宁集解《谷梁》,郭璞注《尔雅》。此外,孔传本《古文尚书》,亦系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作。南朝经学以梁代最为盛。梁代经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皇侃的《论语义疏》,该疏博采众引,所用资料,多至30余位魏晋学者的注疏,反映了当时经学求同存异的风气。梁代经学尤重《礼》学,特别是《丧服》经传。南朝经学,偏重将“自然无为”之道注入儒家经典,又杂汉儒传统,畅于义理诠释而疏于训诂,使经学尽扫烦琐、迂腐、荒诞、无用之敝,标出一代新风。而北朝保存汉末传统,经学传授的重点在于训诂典章制度方面。因此,对于清谈玄虚的魏晋传统采取的是排斥态度。北朝经学以北魏最盛,北魏经师众多,著名者有刘献之、徐遵明、李业兴等人。

3. 文学。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文学革新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东汉建安年间和曹魏前期,文坛以曹操、曹植、曹丕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陈琳、蔡琰等一批文学家,被称为“建安七子”。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魏朝后期的文学被习惯称为“正始文学”,其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公元280~289

① 《南史》卷11《后妃传上·武穆裴皇后传》。

② 《南史》卷45《崔慧景传》。又见《太平广记》卷36《妖怪》九。

③ 参见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年)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以陆机、潘岳、左思为代表的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做出了突破。齐梁两代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顒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谢朓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谢朓的山水诗完全是自然山水的描绘,语言精美、音韵和谐,使五言绝句诗体真正形成。沈约称:“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唐代王维、孟浩然及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皆受其影响。李白对谢朓最为倾心,曾多次称赞谢朓。如《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叔》“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酬殷佐明见赠五云裘歌》“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风雨”。^①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所写的一首《论诗绝句》:“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度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② 诗中的“青莲”,即青莲居士李白。“谢宣城”,即在宣城作过太守的谢朓。这首诗,不仅赞颂了李白登峰造极的文学才华,同时也吐露了李白毕生崇拜谢朓的内心世界。齐梁时代的何逊和阴铿受永明体的影响,对新体诗更有发展。杜甫自述作诗甘苦时,曾说“颇学阴何苦用心”。他在赠李白诗中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③ 可见他对阴、何二人诗歌的推崇。另外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骈文。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

南朝文学之盛,还表现在文学理论专著的出现。南朝齐和帝中兴年间,刘勰撰写了《文心雕龙》,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钟嵘《诗品》是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他评论当时诗文过于讲求对仗、用典、辞藻、声律,从而使表达诗文的深刻内容受到限制,甚至流于空虚贫乏。他还对三曹以来诗歌的师承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作了精彩的考辨,并对各类诗体进行分品,虽个别分品有不公,但对盛唐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还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为梁朝萧统所集的《文选》30卷,共收录作家130家,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文选》是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成为唐宋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

4. 书画雕塑,这时出现了著名的“六朝四大家”: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其中东晋时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善画人物。他的人物画以简练纤细的线条勾画轮廓和衣褶,着重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这四大家在绘画艺术上形成了一个高峰。南齐谢赫不仅画艺高明,还著有《古画品录》,提出绘画艺术的“六法”,对后世绘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北朝北齐的杨子华,被时人称为“画圣”。北齐人曹仲达,善画佛像,后与唐代的吴道子齐名,世称“曹、吴”。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的画被称为“绝笔”。总之,这一时期无论人物画和山水画,以及宗教类画,大都为写实,而且吸收了古代和外国传来的有益“画风”。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法家,如钟繇、索靖、卫瓘等。卫瓘的族孙女卫铄,世称卫夫人,师钟繇,不仅书法高妙,而且在《笔阵图》中阐述了书法理论。王羲之早年师从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草书学张芝,楷书学钟繇,集前代各家之大成,推陈出新,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代表作为《兰亭序》,全文有20个“之”字,字字别开生面,无一雷同,堪称绝代佳作。唐太宗死后,《兰亭序》手迹作为殉葬品“秘于昭陵”。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兰亭序》是唐太宗命令冯承素临摹的。王羲之的妻子郗璠及其数子均工于书法。从北魏至隋唐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皆为世界著名的宗教雕刻艺术。

5. 科学和生产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在中国古代著名的29位科学家中,张仲景、华佗、马钧、裴秀、葛洪、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陶弘景等9人,均产生于这个时代。他们对我国古代医学、机械学、地图学、药物化学、数学、地理学、农业科学、冶炼化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做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晋王叔和改编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二书,对传染病和各种杂病具体治疗和理论都有重要贡献。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等都对中医中药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华佗的麻沸散及开腹大手术等都是医学史上的重大发明。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方法

①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二节《文学·永明诗人与新体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9页。

② 清人王士禛《论诗绝句》,参见上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9页。

③ 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解闷》。参见张承宗等主编《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割圆术”。南朝祖冲之更进一步精确推算了圆周率，求出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两个数值之间，这在世界科技史上竟千年无人超越。^①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裴秀、北魏酈道元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地理学家。裴秀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在《禹贡地域图·序》中，他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著名的“制图六体”。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学专著。魏晋南北朝时，我国机械技术获得了许多进步。为适应战争、生产、生活的多种需要，发明了水磨、水碾、车帆、连续发石机、木牛流马、磨车、翻车、水车等实用性机械，以及飞车、百戏图等游艺性机械和复杂的“机器人”。^②涌现了诸如马钧、杜预、耿询等一批机械发明家。农学成就当首推《齐民要术》，它是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对我国农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简要地讲完了上述二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

论。这400年复杂的历史背景，长期分裂割据，战争、动乱及其破坏性，使各族领导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同苦难作坚韧不拔地斗争中，在强烈求生存和竞争氛围的环境内，共同悟出了这个特殊时代必须以人才、革新、进步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也是在民族大融合中各族人民必须共同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这或许可称之为魏晋南北朝400年历史发展要义的动因和结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赵俊

① 《隋书》卷16《律历志》上。参考何堂坤、何绍庚《中国魏晋南北朝科技史五科学·数学》，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② 参见拙著《中国古代“机械木人”始创年代及其机理考实》，《六朝史续编》，第96~98页。

Two Issu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Zhu Dawei

Abstract: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re the separatism period which last about 400 years. The war promotes active people's thinking; as a result, some new conations appear in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ics, culture,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ts ess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combining Confucianism with law s and Three Provinces and Six Ministries in politic; Fubing in military; Equally Dividing Field System in economy;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the poetry in Yongming style and prose in culture, and all these have far-reaching impacts on later history.

Key words: Three Provinces and Six Ministries; Equally Dividing Field System; Yongming style

观点选萃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李敬峰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李敬峰在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JA720002)撰写的来稿中指出：

朱熹的学说架构性十分明确，注重相互对应，他的本体论—理气论的两元对立、一元为主的模式，落实在工夫论上亦是如此。用“敬”“义”两分的结构来统摄其它工夫，以“格物致知”与“涵养省察”来讲朱熹工夫，则容易造成误解，把朱熹的工夫打成两截，这在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都有此判定，而用“敬”和“义”、“敬义夹持”则可以避免此疑，同时，它也是有内在根据的，孔子主张“求仁”，是要向外发用，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义内”，是说行“义”的根据在于内；而到宋明理学提出“敬义夹持”，把“义”与“格物穷理”联系起来，达到内外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说，“敬”与“义”是朱子心性修养工夫论的支撑点，也是整个理学心性工夫论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

(周勤勤 摘编)